

跨世纪学者丛书

文学史的 形成与建构

WENXUESHI DE
XINGCHENG YU
JIANGOU
陈平原 著

跨世纪学者丛书

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

陈平原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跨世纪学者丛书
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

陈平原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 8 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本社网址 <http://www.gep.com.cn>

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gep.com.cn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1 印张 插页 6 228 千字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册

ISBN 7-5435-2783-9/G·2112 定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总序

史伟

时代在前进，世界正阔步迈向一个新的世纪。将要告别的20世纪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即将来临的21世纪等待着我们的又是什么？中国在本世纪的荆棘载途、崎岖曲折的道路上是怎样走过来的？中国在下一个世纪又将以怎样的面貌出现于世界？处于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跨世纪学者丛书”的出版就是试图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些见解。继往开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是学者应该肩负的使命。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近年来活跃于我国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思想敏锐，视野开阔，是所谓“跨世纪”人才，下一个世纪我国学术研究的重任将主要由他们来承担。所以，由他们来探讨“跨世纪”的问题，我以为是很合适的。

丛书所探讨的中心议题是文化问题。近一个时期以来，文化建设作为精神文明的核心已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终于认识到，一个民族要振兴，一个国家要强盛，除了首先要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外，还必须创造高度的现代文化。在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中，文化建设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搞好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两个关系，一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一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在这两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

中国有着光辉灿烂的悠久文化传统，深入地研究、继承和发扬祖先们留下的这份巨大精神财富，无疑是文化建设的任务之一。但是，世界和中国都已经和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中华民族要能跟上世界潮流，完成现代化事业，在文化建设方面也不能抱残守缺，墨守成规，而需要不断革新，创造新文化。不过新文化的创造决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基础，如果割断历史，离开几千年民族传统的土壤去建设新文化，那它就像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一样不可能持久，也不会有生命力。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决不是意味着传统的断裂，而是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当前面临的问题是怎样使中华传统文化能适应世界潮流和现代社会的要求而变革更新，得到新的发展，使传统和现代化达到辩证的统一。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不管它曾经多么辉煌，一旦它不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而停止创新，那么它就将因创造力的枯竭而逐渐消亡。世界历史上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

至于应该怎样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历史也已充分证明，一个国家闭关自守，把自己同世界隔离起来，拒斥外国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只能导致停滞落后，是绝对没有出路的。尤其是在当代世界经济趋于一体化、国际交往日益密切、信息交流十分便捷的情况下，要想把一切外来文化都拒之于国门之外，实际上也是难以做到的。今天要想建设高度的现代新文化，惟

总 序

有实行开放政策,面向全世界,积极引进和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当然,这不是盲目地照抄照搬,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根据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需要,有分析、有选择地吸取和消化外来文化中有益的养料,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融会创新,来发展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该丛书的作者们从不同的视角研究和探讨“跨世纪”的文化问题,阐明了各自的观点,发人深思,我相信会对广大读者有所裨益。

1996年8月

小 引

为自己的书写序，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因那毕竟代表着又一次耕耘的完成。至于收获如何，很难预料。除了天灾人祸，还有自身才气与学识的限制，实在勉强不得。这话，我在别的地方说过。

不过，这一回写序，却一点也不轻松。原因是，所序之书，并非成于一时一地，心境、思路乃至文笔，都有较大的差异。重新检点，不如意处甚多。事先并无统一构思，如今更是回天乏力，无论如何变不成“专著”。明知世人对于专著的器重近乎盲目，厚积薄发的论文集，或许更值得咀嚼——可惜本书不在此列，无法引以护身。

说白了，这只是笔者七八年间关于文学史与学术史部分文章的结集。若干自以为精彩的短文，已入《学者的人间情怀》和《书生意气》；有些相关的专论，也因《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出版在前，不便重复收录，只好敬请有兴趣的读者费神了。

进入 90 年代，我在北大开设了专题课“现代中国学术史”，已经讲了三轮，越讲越心虚，始终不敢撰写“通论”。倒是

另外三回的讨论课，即带领研究生研读、品鉴章太炎的《国故论衡》、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收获颇丰。即便如此，将讲稿整理成文，恐怕一时半载也无完工的希望。本书第一辑，乃忙里偷闲，于授业解惑之余，连缀成篇。诸文虽不成统系，且未能充分展开，却大都有自家面目。

去年夏天起，借助“老大学的兴衰”，我力图将教育、思想、学术三者熔为一炉，探讨 20 世纪中国的或一侧面。此课题，私心以为大有开掘的余地。可惜刚刚起步，在本书中，也只是略露端倪。“中国大学百年”，不管是作为话题，还是作为文章，都是我最关注的：这里有历史的感慨，也有现实的忧思。此类“盛世危言”，历来不受欢迎，可“不说白不说”。

如果说本书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具体结论之外，很可能是学术史上的“文学史”这一研究视角，以及将学术史研究作为一种自我训练，回过头来重新建构文学史的意向。“重写文学史”，乃笔者本行，始终耿耿于怀。虽说近年笔墨略有转移，可《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以及本书第二辑诸文，还是可以表明我的志向与兴趣。

在《探究“文学史”的形成》一文（载《书生意气》）中，我曾提到，应该追问作为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和著述体例三位一体的“文学史”，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功能以及发展前景。反省学科的根基而不是具体结论，必然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除了共通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更与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文学革命的提倡与追忆、国家权力对学术研究的制约与利用，以及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文学理论的互动等密切相关。除非不穷根究源，否则无法不跨越原有的学科边界；可一

小 引

一旦越界追击，并非通人的我辈，往往捉襟见肘。没有胆量瞒天过海，只好以此素面见人。

1997年12月1日于京北西三旗寓所

目 录

总 序	汝 信
小 引.....	(1)

第一辑 文学史叩问

“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	(3)
四代学者的文学史图像.....	(7)
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	(14)
中古文学研究的魅力	
——关于《中古文学史论》.....	(56)
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	(64)
中国学家的小说史研究	
——以中国人的接受为中心.....	(73)
文学史家的考古学视野.....	(82)

第二辑 小说史叙述

“通俗小说”在中国.....	(99)
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类型特征.....	(120)
关于苏曼殊小说.....	(142)

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

- 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 (151)
武侠小说中的“剑” (200)
超越“雅俗”
——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 (218)

第三辑 大学史寻踪

- 从新教育到新文学 (237)
气球·学堂·报章
——关于《教会新报》 (246)
中国大学百年? (267)
人文景观与大学精神 (302)
跨世纪的文化选择
——读“国学大师丛书”有感 (310)

附 录：

世纪末的思考

- 遥想“九九” (326)
后 记 (337)

第一辑 文学史叩问

“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①

对于今日中国的大学生来说，“文学史”既是一门必修课，也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知识体系；而对于大学教授来说，撰写一部完整的可以作为教材的“文学史”，更是毕生的追求。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可以千变万化，但写作策略以及研究思路则岿然不动。面对如此坚挺的“学科”，我想提一个小小的问题，“文学史”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破除“迷信”的最佳方法，莫过于思考这一学科的建立，以及这一知识体系的诞生。

“诗文评”及“文苑传”的写作策略，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确有较大的区别。但这不等于说，古代中国人在谈论（评判）文学时，没有“史”的意识。刘勰、胡应麟、焦循等人的见解，仍为今日的文学史家所津津乐道。只是古已有之的“文章流别论”，转化为今日流行于学界的“文学史”，仍应归功于西学东渐的大潮。这里涉及晚清以来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梦想、“五四”

① 本文是笔者 1995 年 10 月在香港科技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学史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要。

文学革命提倡者的自我确证，以及百年中国知识体系的转化。在我看来，还有一个环节值得关注，那便是教育体制的嬗变。

有必要重新探讨晚清西方教育体制的引进对中国传统学术精神的冲击、“学部章程”等教育法规对于学术转向的诱导，以及文学史教科书编撰方式的流弊、西方（含日本）汉学家的正面及负面影响。在 20 世纪中国学界，“文学史”作为一种“想象”，其确立以及变形，始终与大学教育（包括 50 年代以前的中学教育）密不可分。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 100 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

“文学史”之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教育改制。废除科举取士，开办新式学堂，此举对于中国文化进程的影响极为深远。晚清学部（以及民初的教育部）对于课程设置、教科书编写和学生考试方法的规定，乃“文学史”神话得以成立的决定性因素。1902 年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与“文学”相关的课程，只是“诸子”与“词章”。1903 年《奏定大学堂章程》则规定，“中国文学门”的科目包括“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源流”、“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和“西国文学史”等，并有明确的提示：“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第二年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馆的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的章节安排上，完全依照学部章程的要求，并且坦承此乃“仿日本笛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①。汉学家（正如林传甲所说的，笛川此书“其源亦出欧美”）影响中国教育的决策

^① 参阅夏晓虹的《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载《文学史》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者；决策者制定的章程又制约着中国学者的论述策略，这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但颇有象征意味。“五四”以后，中国学术日渐独立，研究者不再直接受制于汉学家的思路；至于教育部颁布的规章制度，则仍然深刻影响“文学史”的著述与流通。

“今代学制，仿自泰西；文学一科，辄立专史。”^① 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明显对此趋势不以为然；但既然执教大学，便不可避免地投入“文学史”的写作。鲁迅30年代多次表示撰写文学史的愿望，但终于落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其脱离大学校园的“庇护”，也没有写作讲稿的“压力”^②。说到底，体例明晰、叙述井然、结构完整的“文学史”，主要是为满足学校教育需要而产生的。这就决定了其写作很容易受到政教权力的控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人刘知几所述官修史书所面临的困境^③，对于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史家来说，并不陌生。全国统编教材，有利于“文学史”权威之建立，这对组织者及编撰者是个极大的诱惑；但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不允许冒险闯禁区，绝难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④。必须考虑各种利益集团的需要，平息各种学术流派的纷争，因此，只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作为普及教育的工具，此类著作当然必不可少；但将文学史研究等同于

① 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第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版。

② 参见本书《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章最后一节。

③ 刘知几撰《史通》，《忤时》篇力陈设馆修史之“五不可”，《辨职》篇则正面立论：“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廊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岂与夫冠猴献状，评议其得失者哉！”清人万斯同、焦竑等对此有进一步的发挥，参见《潜研堂文集·万先生传》引万斯同语，以及《澹园集·论史》。

④ 司马迁：《报任安书》。

撰写教科书，则是天大的误会。

从“诗文评”、“文苑传”转为“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此乃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自觉选择。由此而使得这个世纪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与叙述，迥异于前人。“文学史”在本世纪中国学界的风行，主要得益于“科学”精神、“进化”观念以及“系统”方法的引进^①。分析这三大支柱的形成，以及在中国学界的流变，需要更多的篇幅。这里只提出两个小问题：一是以西方的文体观念来剪裁中国文学，提倡“小说”而冷落“文章”，这一学术转型既带来无限生机，也隐含着蔑视中国固有文类的陷阱；一是所谓“清儒家法”，所谓“神悟”与“体味”，以及重新弥合“文”与“学”的追求，始终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声音。

“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从一个特定角度，凸现了中国人对西方教育体制和研究范式的接纳，以及对固有学术传统的改造。反省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研究，目的是为了重新寻找出发点。

① 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莫过于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国学季刊》一卷一号，1923年1月）和郑振铎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见《中国文学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